



21世纪东欧文学：

复杂，夺目，边缘的光芒

高兴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东欧”更多的是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东欧剧变后，情形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概念。今日，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而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不少作家也在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不适用于文学定位和评判。但我们之所以依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和研究，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二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变更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东欧”之外，我们还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指涉这些国家。

历史，创伤，无尽的矿藏

历史之重和时间之痛，成为东欧作家们取之不尽的文学矿藏。东欧剧变后，不少东欧作家都将再现历史和书写苦难当作自己创作的首选。而有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这样书写的东欧作家，在新世纪伊始开始收获荣誉和成果。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两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和纳达什·彼得(Nadas Peter)。

2002年，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经历”。评委会高度评价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维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其实，凯尔泰斯早在1965年就完成了此作，但因种种原因直到10年后才得以出版。小说叙述者是个名叫久尔吉·克维什的犹太少年。他在纳粹大搜捕中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集中营，完全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但他却学会了生存和适应，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人们无法开始新的生活，你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因此，他决心要“继续过那没法过的生活”，并且把它当作一种正常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除了残酷，除了恐怖，他居然还能时不时地找到一些快乐。凯尔泰斯的文字极为朴素、自然，不加任何修饰，语调也十分平静，甚至平静到能和残酷的大屠杀形成一种不太协调的强烈对比的程度。这种风格贯穿了他创作始终。

实际上，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书写同一个主题：大屠杀。“每当我考虑写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会想起奥斯维辛。”他说，“每位作家都有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经历。大屠杀的阴影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光亮，凯尔泰斯也因此被人们称作“从奥斯维辛走出来的作家”。

纳达什·彼得于2005年出版了历时18年创作完成的三部曲小说《平行故事集》：《无声的王国》《黑夜的深处》《自由的呼吸》。小说情节围绕着匈牙利和德国的两个家庭展开，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肉欲、阴谋、大屠杀、贫困、种族主义、犹太身份、仇恨、复仇、恐惧等话题。小说中，时空不断转换，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到60年代初的匈牙利，展现出一幅欧洲现当代历史画卷。全书共有39章，每一章的故事、背景和人物都截然不同，彼此平行，因此，每一章都可被视为一部独立的小说。“世界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他的历史时，还是历史在讲述我们？该书为纳达什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平行故事集》在匈牙利国内和欧美世界均获得了显著的关注和反响，赞誉和批评皆有。不少读者将它当作一部迷宮般的里程碑式之作。《匈牙利民族报》称赞它为“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而英国书评家蒂博尔·费舍尔则在《卫报》发表文章批评这部小说过于松散、随意，犹如“一块巨大的历史肥皂，随处冒出一些泡泡”，并指责作者滥用色情描写。此前，纳达什于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回忆之书》，以高度细腻的史诗性描写表达了对历史的叩问：到底我们在讲述历史，还是历史在讲述我们？该书为纳达什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同样在2005年，波兰犹太裔传记作家阿佳塔·图斯兹斯卡(Agata Tuszynska)出版了传记小说《被告维拉·格兰》。这部传记更多地呈现历史和人性的幽深和复杂。小说主人公维拉·格兰是犹太人，二战期间曾在华沙犹太人一家高档酒吧当歌手。出入酒吧的既有犹太贵族和知识分子，也有被纳粹收买的犹太线人。格兰的一名伴奏演员沃拉迪斯拉夫·斯皮尔曼后来写出一本《幸存者回忆》。波兰裔法得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将之改编成电影《钢琴家》。战后，格兰觉得斯皮尔曼欠她人情，就去斯皮尔曼就职的华沙电台找他，请他帮自己找份工作。但斯皮尔曼却对她板下脸来，冷冰冰地说了句：“我听说你曾与盖世太保合作。”从此，整整一生，格兰都被这一谣言纠缠，谣言影响并

破坏她的生活和作品，甚至使她不断陷入各种受难幻觉。三番五次的审问，都没能证明她有罪，但格兰还是难以自证清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渐渐地被人遗忘。但格兰却不能忘却和原谅。1980年，她自费出版一本回忆录，将矛头指向斯皮尔曼，指责他当过犹太警察。她曾见过他穿着制服，拽着女士的头发，迫害她们。图申斯卡承认，格兰的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也许，她只是想以此方式来反击斯皮尔曼。作者在叙述中有意识地将各种事实和情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模糊、幽深、真假难辨的画面。面对这一幅幅画面，读者很难对历史作出结论。历史之重，有时恰恰在于它的纠结和复杂，难以澄清、难以描述。历史可靠吗？历史会不会有着众多的空隙，无意中掺入误解、冤屈和仇恨？维拉·格兰迷人而又悲剧的一生，无疑是对历史和人性最有力的追问。

捷克女作家拉德卡·德内玛科娃(Radka Denemarková)于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希特勒金钱》。小说女主人公吉塔·劳希曼诺娃是在捷克的德裔犹太人。她逃出集中营后，曾六次试图重回故土，却始终未能如愿。作者擅于烘托氛围，并通过挖掘人物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小说时间跨度大，空间却有限，在同一个乡间舞台，通过激烈程度不同的戏剧冲突，灵活运用插叙、闪回、白描、切换视角等艺术手段，让小说散发出冲击力和感染力。这部作品内涵丰富，惊心动魄又意味无穷，涉及人性、正义、清算、记忆、良知等主题。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它视为对法西斯的有力控诉。

探究，反思，作家的勇气

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东欧读者更加敬重和喜爱那些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进入21世纪之后，很多东欧作家的创作仍然与爱国心、民族自尊、民族认同和同甘共苦等微妙的情感联结在了一起。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始终将见证与反思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原本有机会移居国外，却在祖国危难之时回到了布拉格。他坦陈，选择归来，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文学生命难以离开母语和故土。2009年，克里玛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身为犹太裔作家，克里玛曾经历过战争、集中营、解放、教条主义时期、“布拉格之春”等等，对世界变幻和人性莫测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正如他说，“有过极限经历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一个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极限经历会将他引向智慧之路。还有很多人，永远也不会懂。”因此，及时的反思、自省和清理，防止极限、荒谬和罪恶重现，防止悲剧重演，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为重要。作家的亲身经历和细节使得该书生动、有力，丰富而意味深长。克里玛在书写这部作品时，内心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这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许多东欧作家的最感人之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在新世纪推出的《接班人》(2003)、《石头城陷落》(又译《错宴》，2008)和《事故》(2010)都在探究真相，反思历史，这是他众多小说的主题。在《接班人》中，政府指定的接班人在新居离奇死亡。一时间，传言四起，难辨真假。一个又一个嫌疑人进入警方的视线，一个又一个迷局随之出现。真相在哪里？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事故》中，欧洲议会官员Y先生和情人罗薇娜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难。出租车司机对事故故意闪烁其词。由于遇难者的特殊身份，东欧多国安全部门介入此案，但调查毫无结果。唯有一名警官锲而不舍，通过分析目击者的证言，两位遇难者的手记和罗薇娜朋友的回忆，抽丝剥茧地理出了事故背后隐藏的故事。《错宴》中，战争扰乱甚至颠倒了一切。主人公古拉托托夫曾经的异国同学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关键时刻，为了拯救无辜同胞，大夫宴请了这位同学。可宴会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始终是个谜，也成为大夫后来蒙冤的直接缘由。爱国者最终却背上了叛国者的罪名。这是历史的玩笑和误会，还是时代的荒诞和悲哀？由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问：对人性、对存在、对专制、对政治、对社会。卡达莱是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小说精致，写作路径多元。在艺术手法上，一贯表现出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各种写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读性。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究、追问和反思。他于2000年出版的随笔集《另一种美》是一部跨文体作品，将回忆录、人物速写、书稿、沉思片段、小品文以及诗论等融为一体，形式灵活，时空多变，话题丰富，仿佛引领读者参与了一场场心灵之旅，有时仿佛邀请艺术同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一次次对话。桑塔格评论说：“《另一种美》是沉思的，准确的，狂想的，悲伤的，谦恭的，容易引起惊

奇的。整部书，无时无刻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跌宕起伏。一切都散发着独特韵味、启示和隐喻。”

开拓，创新，后继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东欧文坛已涌现出不少视野开阔、底气十足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文学成就显著，展示了东欧文坛新生代的实力和魅力。

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凭借长篇小说《宁静海》(2001)在欧洲文坛一举成名。小说最表层的故事围绕着母亲和儿子展开。“我”同母亲居住在布达佩斯老城的一套旧公寓里，曾是话剧演员的母亲，自尊心 and 虚荣心都极强。在女儿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业严重受挫，前途无望。在此情形下，她决定将自己关在塞满家族遗产和舞台道具的公寓里，整整15年，足不出户，直至死亡。“我”是一名青年作家，本应有自己的生活，却被母亲牢牢拴住。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完全依赖儿子，还想在心理上彻底控制他，甚至反对和破坏他的私人生活。就这样，家变成了地狱，儿子成为了囚徒。但外部环境在急剧变化：冷战结束，匈牙利社会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家庭专制依然如故。小说涉及从母子关系到人性深处，从外部环境到内心世界，从家庭故事到社会景象的方方面面；写得密集、浓烈、大胆、极致，犹如长久压迫后的一场爆发，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

在匈牙利文坛，托斯·克里斯蒂娜(Toth Krisztina)作为诗人的成就已相当引人注目。2013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鱼缸》，获得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认可。这是部关于女人，尤其是匈牙利女人的小说，语言极为细腻，充满了动人的女性色彩。小说中的女人都有着母亲和女儿的身份，历经生育、领养、堕胎、被遗弃……这又是部关于孤独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孤儿，她们的磨难和痛苦又与社会和时代有着深刻的联结。因此，讲述这些女人的故事，也就是在讲述时代的故事。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作家提供了特别土壤。

如果没有经历过波黑内战，波黑作家伊斯梅特·普尔契奇(Ismet Prčić)就不可能写出《碎片》(2011)这样的优秀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叫伊斯梅特·普尔契奇，他离开饱受战争磨难的波斯尼亚到美国生活，却怎么也忘不了过去。于是，他开始记日记，书写回忆录。整部小说正是由那些日记、回忆和故事碎片组成。它们常常相互纠缠、呼应、遮蔽，最终融汇于一体。现在常常蒙上过去的阴影，过去常常让现在面目模糊；而生活恰恰是由各种碎片组成的，其中过去和现在有时实在难以分辨。

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是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代表诗人。进入21世纪后，格尔特雷斯库主要致力小说创作，出版了《炫目》三部曲等作品。小说创作显然为他提供了更加广阔自由的天地。存在中的一切都能激发起他的创作热情：日常、情感、历史、欲望、性、内心、宇宙、未知世界、童年记忆、个人经验等，呈现出让人炫目的丰富性、内在性和多元性。很难用一个标签来界定他的创作，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日记体、魔幻、神话、小品、科幻等手法和门类都可以在他作品中读到。凭借超凡的想象，丰富的词汇、饱满的寓意和哲思，以及多变的文体和手法，他仿佛掌握了一套小说艺术点金术，让平凡的题材和古老的题材焕发出耀眼的光芒。目前，这位“充满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勘探者”已成为罗马尼亚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

捷克小说家雅奇姆·托博尔(Jachym Topol)是当代捷克中生代代表作家，在新世纪，已写出好几部精确描述捷克社会状况和人们心理的作品。2013年，他凭借小说《魔鬼作坊》引起了世人关注。小说主人公生来在特雷津小镇有一段恐怖的历史。主人公利用各种途径，搜寻历史片段。经历了离开又重返小镇，叙述者在不久之后发现自己逃到了白俄罗斯。那里，新的恐怖让主人公感觉自己一直希望摆脱的魔鬼更近了。小说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警醒意味，尤其能引发曾经经历法西斯恐怖的人们共鸣。

2015年，保加利亚作家杰奥吉·戈斯鲍迪诺夫(Georgi Gospodinov)的长篇小说《悲伤的物理》为欧美文坛所瞩目。小说看似内容散乱，但结构复杂别致，内涵丰富，不到300页的小说涵盖了家族历史、成长经历、乡村故事、世界末日，以及“我是谁？”等人类基本问题。总体而言，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南欧人民的生活境况。在偏远的保加利亚乡村，叙述者及其家人长期居住于地下室。这既是真实写照，又具隐喻色彩。作为一部关于悲伤、丧失和遗弃的小说，《悲伤的物理》却并不沉重，反倒因视角的变幻、语调的控制和细节的讲究给读者带来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但轻松有趣背后发人深思的部分，才是它思想分量和艺术价值的所在。



书讯

走进托卡尔丘克的“半边宇宙”

2019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授奖演说里，托卡尔丘克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理念，她的作品也由此吸引着越来越多读者的目光。今年7月，托卡尔丘克的最新作品《怪诞故事集》出版，不久，她的另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小说集《衣柜》也在8月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将推出托卡尔丘克作品全系列(共9部)，9部作品均从波兰语直接翻译，包括长篇小说《糜骨之壤》《最后的故事》《雅各布之书》等，以及小说集《鼓声齐鸣》等。

出版于2018年的新作《怪诞故事集》便收录了这样10个怪诞、疯狂、恐怖和幽

默的故事：《旅客》的故事发生在一次越洋长途旅行的夜航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向我讲述了他幼年时期在床边常常看到的恐怖身影；《罐头》着眼于母亲死后留下的笔记本，那上面是写满各式奇怪罐头的菜谱，而“我”在地下室和厨房又发现了一批批奇异的罐头……

托卡尔丘克在早期作品中亦发挥出对现实细节精妙把握和加工的功力，成书于1997年的小说集《衣柜》便是其中代表。《衣柜》囊括了三个极具超现实色彩的故事。其中，《衣柜》着眼于一只普通的旧衣柜，主人公在搬家时将它从二手市场带回，此后渐渐发现这只衣柜宛如一个能量坑，散发出神秘的吸引力；最终，夫妻双双住进了衣柜里。《房号》突出展现了托卡尔

丘克“第三人称叙事”的魅力：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身为客房服务员的“我”，“我”游走于首都饭店的不同房间，循着蛛丝马迹捕捉客人留下的气息；同时，“我”也以房客视角观察着一切，通过充盈的想象填补客人的不在场。《神降》则是一个带有卡夫卡小说韵味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宛如创世之神的编程天才，在属于电脑程序的“半边生活”中，他不断构筑新世界，却又对人类屡屡失望……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托卡尔丘克敏锐的洞察力和温柔之心，亦能感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统观全局的智慧。在“引弓国际文学节”上接受专访时，托卡尔丘克说：“文学还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它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我们眼前的小时空。”平静叙述下流淌的弦外之音，需要读者以敏锐的感官去发掘。(宋 闻)



匈牙利画家米哈伊·蒙卡奇油画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 TAN